

刘之遴所校《汉书》古本真伪考

李 艳

提 要 班固创作《汉书》,至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完成纪、传部分,至其去世时仍未能完成《汉书》全稿。《汉书》未完成稿后由班昭等对其进行整理、校勘,并续作,形成后世流行的《汉书》全本。《汉书》真本和《汉书》流行本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刘之遴所校《汉书》古本所呈现的特征与《汉书》的创作状况和所处时代相符合,并非伪书,而为《汉书》真本。

关键词 《汉书》 刘之遴 古本 真伪

《南史》记载了《汉书》古本事,认为该古本是班固创作的《汉书》真本,后由刘之遴等人对之与《汉书》流行本进行比较。对于该《汉书》古本是否为《汉书》真本,后代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要对《汉书》作进一步的研究,就必须对这些看法进行论断和分析,这样才能推动对《汉书》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汉书》真本”这一学术公案进行再探讨,并顺带论及刘之遴所校《汉书》古文真伪问题。

一 关于班固《汉书》真本问题

班固是否完成《汉书》的创作因范晔《后汉书》的记载而谜团重重,因为它既说其在章帝建初年间完成,又称有班昭、马续补续之事。历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为典型的是冉昭德先生的观点,他先是在《班固与〈汉书〉》一文中认为“班固死后,《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写成,和帝命其妹班昭补作,又命马续补作《天文志》”,^①随之于第二年又发表《班昭、马续补作〈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志疑》推翻前之论断,^②认为《汉书》全篇都是由班固完成的。尔后,学界鲜对《汉书》的完成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大都是在论及班固或《汉书》时简略带过,观点也不统一。

笔者认为,班固并未完成《汉书》的创作,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中记载的《汉书》“至建初中乃成”指的是班固于建初年间完成纪、传部分,^③而不是《汉书》的全部内容,这为刘之遴所校《汉书》古本为真本提供了可能。

范晔作《后汉书》已是南朝刘宋时,在此之前,关于东汉历史记载的资料相当丰富。东晋袁宏创作《后汉纪》时,已有相当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如《东观汉记》、《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等。众多的

① 陈其泰、张爱芳主编《汉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② 《光明日报》,1963年2月24日。

③ 范晔《后汉书》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4页。

史料和著作作为范晔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人赵翼在论其成功原因时认为“《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籍手……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成书既多,采择自易,兼有迁、固为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当”。^①对于整理史料的功夫,范晔是相当自信的,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而“班氏最有高名”,自己与之相比,“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他的《后汉书》也确实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南朝梁刘昭称“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称其“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②其书面世后,它种关于后汉的史著便逐渐湮没于浩瀚史籍,唯有范书盛传至今。既然范晔可参校的史料丰足,整理史料的水平也很高,其书也得到时人和后人的认同,而班固又是其最为敬重的史家,就像班固对司马迁的仰慕一样,范晔对于班固其人其书甚至其家族、家人应会倾以更多的关注和考证,但为何他的《后汉书》中却出现“建初中乃成”和“其八表和《天文志》未及竟而卒”看似矛盾的叙述?^③

依常理,如果建初中写成的是《汉书》纪、传、志、表全本,而班昭传记中再提八表、《天文志》未成,这样明显的前后不一致,范晔写作时不可能不注意到。即便是范晔疏忽了,但从《后汉书》写成到唐人编《隋书》近二百年间,亦未见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再看诸家作后汉史,都以纪、传为重,表不再作,而志也少见。正因为如此,刘昭在其《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就曾感叹“至乎永平,执简东观,纪传虽显,书志未闻”,只有司马彪《续汉书》“总为八志”,“接继班书”,而“叔骏(华峤)之书,是为十典,矜缓杀青,竟亦不成”。这些后汉史书,尽管没有表、志,只有纪、传部分,却仍无损于其为东汉史书的地位,似乎在时人看来,纪、传内容可以指代该史书。范晔就曾以《后汉书》之名来指代其纪、传部分,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至其入狱时完成的只是纪、传,但他在文中仍称“既造《后汉》,转得统绪”。同样,在整理《汉书》完成情况的史料时,如袁宏《后汉纪》中有“至建初中其书乃成”和“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④的记载,范晔应该清楚建初中完成的是纪、传部分,不包括志、表,故在班昭传时又提八表、《天文志》未成,在他和时人的观念中,纪、传部分可以作为《汉书》的代名词。

另外,《隋书》也透露了班固于建初年间完成纪、传的信息。据《隋书·经籍志》:“建初中始奏表及纪、传,而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之”,范晔在《后汉书》中专门列出“建初中书乃成”当缘于有奏书一事,班固曾与陈宗等完成《光武本纪》及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分别有上书之举。莫说帝王有监督史官、审阅史稿的惯例,且依班固急于向帝王展现才华、希冀得以重用的心情,他作完《汉书》纪、传部分立即上奏朝廷也应是情理中事。而奏书之举亦能说明,建初中完成的必不是全本,只是部分,因为如果建初中完成且奏上的是纪、表、志、传全本,若帝王不能及时审阅,监督之责就大打折扣,再则,若是全本,应该会在朝廷存档并有副本,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表、志的未完或遗散之说。至于《隋

① 赵翼《陔余丛考》卷5《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7页。

② 刘知几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上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10册,第2784页。

④ 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527—528页。

书》称该次献书还包括表的记载采自何书,今已无从考证,也许此次奏书还包括表的已完成内容,或是表的序论部分。

二 关于《汉书》的流行版本问题

班固自建初中完成《汉书》的纪、传部分,直至去世约十年间,班固没有全部写完《汉书》,故而范晔《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条称:“(班昭)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①《汉书》的流行本是由班昭等人补续的,它和《汉书》真本有着区别,这和刘之遴校《汉书》古本时所提出的诸多不同是相吻合的。

至于刘知几《史通》称班固已经完成《汉书》,只是因受窦宪牵连,卒于洛阳狱而致使书稿散乱,不能综理,这只是他的一种推测,可能性不大。因为班固最初因私撰国史入狱时,书稿被完好上呈朝廷,而此时《汉书》是受明帝旨意而作,即使因罪入狱,书稿应由官府没收并上奏,因窦氏事而牵连的人甚多,班固的冤狱却能引起和帝的注意,当是其未完成书稿由官府上呈到朝廷的缘故,加之和帝当初计划除掉窦氏时就曾借鉴其书所载外戚史事,对班固的为人和才学已有好感,也才有后来为之平反和征诏班昭续书等事。冉昭德先生在其《班昭、马续补作〈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志疑》中对补续《汉书》之事提出质疑,但他忽视了前人把《汉书》诸篇看成一个整体,并统归于班固名下,在谈及具体篇章时便不再细加说明的情况,而以“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班固撰《人表》,而古今为目”等前人言论来推论表、志均由班固完成,^②甚至以志、表多是沿袭、取材于《史记》,“不过加以调整补充而已”,“工程并非浩大”,而认定班固能够完成志、表,该推断不符合实际也难以有说服力。

班固没有完全完成《汉书》,书稿未能按既定结构进行整理,文字上又有古奥的特点,时人多不能通,班昭为班固之妹,也同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且博学高才,故和帝征诏班昭入东观藏书府,对《汉书》书稿进行整理、校勘和补续工作。整理即是按照《叙传》既定结构对各篇章进行重新编组,校读即是凭借班昭深厚的学养以及其它有利条件校读《汉书》,马融从昭受读,当指此事,正因为有班昭整理、校读的工作,才有《汉书》流行本与真本的不同,也才会有宋景文校刻时所校旧本中“曹大家本”的存在。

关于《汉书》补续问题,就两点需要考虑,一是需要补续的内容,二是各部分内容具体由谁完成。据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在“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又参照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班固叙《汉书》、马续述《天文志》”、袁宏《后汉纪》“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等史料记载,表和《天文志》需要补续应该比较接近史实,又八表之《古今人表》为品评古今人物,较易引发人们争论,而从班固年轻时就敢以人物品评的方式向东平王苍荐表的自信和班昭的谨慎做人来看,该表很有可能为班固所作,是否做完尚无从考证,故暂且属未完之表。

据《后汉书·班昭传》关于《汉书》补续的记载及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所载“其妹

^① 范晔《后汉书》第10册,第2784—2785页。

^② 刘知几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上册,第65、110页。

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取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班昭自受诏入东观补续《汉书》,虽在禁中十余年,但仍未完成诸表,后由马续继之完成,这一方面是因为制表是费时费力的工作,必须详阅宫廷档案、宰辅记录等,另一方面,班昭在制表之余,既要整理、校读《汉书》,还要充当帝王、后妃的顾问、侍从,精力牵扯太大。马续在继班昭完成诸表后,又补续《天文志》,对于此论,历代学者基本无异议,如司马彪称“马续述《天文志》”、袁宏称“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刘昭称“续志昭表,以助其间。”袁宏在其《后汉纪》中把诸表和《天文志》皆归于马续名下,称“续尽踵而成之”,朱维铮在其《班昭考》中就此条认为“盖袁以名教卫士自许,纪中一概抹煞东汉列女事迹,故全书不出昭名”^①,其实,上条为袁宏在记马融事迹时附述其兄马续之事,且马续确对诸表及《天文志》作了最终结篇的工作,故在文中不再对班昭续书情况详作介绍,是可以理解的。

三 《汉书》古本特征与《汉书》的创作情形的考察

班固所作《汉书》真本是未完成稿,这为《汉书》真本存在提供了可能;而《汉书》流行本是由班昭等人补的,不同于《汉书》真本,这一点也和刘之遴等人校对《汉书》古本与流行本时提出的诸多不同相吻合,那么,刘之遴所校《汉书》古本本身所呈现的特征是否符合于《汉书》真本呢?

《汉书》古本的记载分别见于《南史》卷一八宋《萧琛传》和卷五〇梁《刘之遴传》:

始琛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赍一瓢芦,中有《汉书·序传》。僧云:“三辅旧书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书饷鄱阳王范,献于东宫。(《南史·萧琛传》)

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南史·刘之遴传》)

据以上资料,《汉书》古本是由萧琛得于南渡北僧,后又献于鄱阳王萧范,并由刘之遴等人对之与今本参校异同的。对于该古本是否为真本,从现存资料看,自梁时发现古本、唐人又据以前史料作《南史》记载该事,直至北宋时期,人们对之似乎并不怀疑,相反,学者往往还以该古本作为参考本来考校今本,如唐人颜师古《〈汉书〉叙例》中“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北宋宋祁校对《汉书》时,以古本对照今本异同处就达36次,又全集中在纪、传部分。而从南宋开始,学者对此古本真伪多有异议,但信

^① 朱维铮《班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第27页。

其为真本者多是罗列《南史》材料,很少对之加以考证,即使赵翼在论证该古本为真本时,也只是把二处材料联系起来后,以“宋景文校刻时,其所校旧本内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与今同,则今本即曹大家所定无疑也”作为佐证而草草结束。^①持伪书观点的诸家论证多是在以今本的结构、篇目及内容为真的前提下来对照古本,又往往忽视班固创作中途有上奏已完篇目的行为及东汉有专人校书、整理书籍的事实,甚至以当时无纸加以简单否定,而不考察在蔡伦改进纸张之前已经有纸墨的存在,这其中又以《四库全书总目·〈汉书〉提要》最为典型,它就《南史·刘之遴传》中刘之遴校对《汉书》古本时所提出的六条内容《汉书》古本的上书日期、《叙传》号为中篇、称班彪自有传、纪传志表相合为次为三十八卷、《外戚传》和诸王传的位置、《韩彭英卢吴·序》)分别加以驳斥,认为关于《汉书》古本的说法“以今考之,语皆谬妄”。然而,今本《汉书》是历经班固创作、班昭等人的整理和补续并由后世传抄而得以流传的,和班固所作真本原貌已有出入,故而以今本比照古本得出古本为伪书的结论是不够严谨的。相反,通过对前代史料及评论的分析、辨别,并联系班固的个人情况、创作心态和时代条件等内容对之进行考察,《汉书》古本是符合《汉书》的创作情况及其所处时代的,它为班固《汉书》真本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分列如下:

(一) 北僧称古本“三辅旧书相传,以为班固真本”。东汉末年,孝献帝移都时,宫中所藏之书遭到极大破坏和遗散,隋人牛弘称其为书之五厄之一,据其介绍,当时“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②“三辅”原指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的合称,后泛指京城长安附近的地区作为西汉京师,如张衡就曾“少善属文,游于三辅”,^③宫中收藏的班固所献书稿有可能在此次“书厄”中流传于“三辅”。

(二) 古本“纸稿甚古”。前代学者多认为当时无纸,如四库全书《〈汉书·叙传〉考证》称“永平中何由有纸,即此足破其妄”。据《后汉书·蔡伦传》,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为材料制成,并于和帝永初元年(105年)上奏朝廷,得到和帝的称赞,此事距明帝即位永平元年(58年)不过四十余年,这其中还包括蔡伦造纸实验的时间,且纸张发展本就有一个发展过程,蔡伦改进技术是基于前代的造纸经验,“蔡侯纸”只是相别于当时纸张的称号,《汉书》撰写之时,应有纸的存在,只是技术相对落后,故《萧琛传》中称“纸稿甚古”。又据考古材料,纸的发明可以远溯到西汉,如陕西出土的坝桥纸、扶风纸,内蒙居延出土的金关纸,均质地粗糙,且范晔《后汉书》中也多次提及和帝之前即有纸墨,如守宫令就有“主御笔纸墨”的职责;^④汉章帝就曾赐予贾逵“简纸经传各一通”。^⑤既然《汉书》创作时代已有纸张存在,那么以永平年间无纸来否定《汉书》古本为真本则难能成立。

(三) 古本“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关于《汉书》的文字,范晔《后汉书·列女传》称“《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颜师古也在《汉书叙例》中也称“《汉书》旧文多古字”。

① 赵翼《陔余丛考》卷5《〈汉书〉古本》,第104页。

② 魏征等《隋书》卷49《牛弘传》,第1298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59《张衡列传》,第1897页。

④ 范晔《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第3592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36《贾逵传》,第1239页。

班固作为东汉的古文经学家,对先秦的古文字比较熟悉,在《汉书》创作中,其文字书写有可能受古文字的影响,呈现古文化倾向。若《汉书》是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成,时人不应该不通;班固又“工篆书,李斯曹嘉之法,悉能究之”(唐代张怀瓘《书断》下),在《汉书》书写过程中融合隶书、篆书和古文字,形成其特有的书写方式,可能性较大,也正因其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文字,多有古拙之风,时人才多不能通,而这正合《汉书》古本“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的特征。其实,非隶非篆的文字在东汉碑文中就有出现,如东汉安帝元初年间著名的《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就兼篆、隶二体,篆书意味又稍强于隶书意味,很多字形上仍保留篆书痕迹,清代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平碑记》称其为“非隶非篆,盖兼两体而为之,至其纯古道厚,更不待言。”

(四) 古本中有“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的字样。此处是有关班固上书年月日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汉书〉提要》就以古本有纪、传、志、表全本,而范晔书本传中又称“建初中乃成”等推论班固不可能于永平十六年完成《汉书》并能上奏。其实,班固在创作《汉书》过程中有多次上呈已完稿的行为,永平十六年距受旨著书已有十年,班固完全有可能于该年上书,且该古本并非全为此次所上书稿,应是多次上书的合集。东汉有专门的校书场所和校书人员,负责保存、整理和抄录副本的工作,如班固就曾为兰台令史、校书郎典校秘书,《东观汉记》的成书就是一例,初有班固等作《光武本纪》奏上,又有二十八列传、载记奏上,加之刘珍及其后续者在东观相续撰写的史书,最终整理为《东观汉记》。同样,对于班固多次上呈的《汉书》部分已完稿,校书人员应会予以保存,而《汉书》又未完全交稿,故还未按《叙传》所安排的结构进行整理,这个工作留给了班昭。况且,据学者推算,古书年月日的记载与《三统历》闰五月己丑朔及《续汉书·五行志》“永平十六年五月戊午晦”相合。^①至于古本是否为纪、传、表、志全本,刘之遴并未指明,笔者认为,刘之遴考校异同时,人们一般已认同《汉书》有未完或遗散之稿,若古本中志、表已经完全结篇,则有悖于补续一事,对于时人的既定观念有较大的冲击,刘之遴应当作为主要点指出,但其所举几例中并无此事,当是古本《汉书》中志、表部分存有未完稿,与当时说法一致,故刘之遴不再专门指出。

(五) 古本称“稚生彪,自有传”。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书〉提要》称“至云彪自有传,语尤荒诞”,认为彪乃东汉人,不应在《汉书》中“自有传”。班固在永平六年(公元63年)为校书郎时,与人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加之《光武本纪》,几乎囊括了东汉建国、光武朝之史事,而班彪为其父,且在窦融归顺光武等事中有功绩,且在思想、学术方面有一定建树,其传当在二十八篇列传、载记之中。又,该传与《汉书·叙传》都出自班固之手,《叙传》作时,《班彪传》已上呈帝王,为避重复,班固在《叙传》中不再载录班彪事,而以“自有传”带过,并非是指《汉书》中有班彪传。而今本《叙传》中有班彪之事,应是班昭在整理《汉书》书稿时补录而成。

(六) 古本中“《叙传》号为中篇”。刘之遴对于该异同叙述未作具体说明,这也引起后代学者对“中篇”之义多有疑问。但刘之遴对此专门提出,应是古本《叙传》确有明显地不同于今本《叙传》之处,或是指篇名,或是指篇中位置。古本《汉书》是班固按创作先后上呈朝廷的书稿合集,又明帝建初年间完成的篇目是纪、传部分,即先作的部分是纪、传,

^① 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页。

而《叙传》又为传中末篇,则该古本的篇目顺序应是纪、传(末篇为《叙传》)、表、志(或志、表),则《叙传》相对于今本末篇位置,在古本中恰为篇中位置,故刘之遴称“《叙传》号为中篇”。这是从篇中位置角度考虑,可能性相对较大。另有一种可能则是,刘之遴所称“号为中篇”是指古本《叙传》的篇名不同于今本。《叙传》是班固依照《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作的“序”,是其著史意图、著史内容及篇章布局等相关情况的介绍,也是让皇帝迅速理解并支持其创作的重要篇章。但“序”毕竟不同于《汉书》记载西汉历史的内容,为了让帝王更清晰地了解全篇布局,班固作初稿时,在篇名中对“序”作为传中篇目进行解释,为“序传中篇”,即“《序》(传中篇)”,又《南史·萧琛传》也称“序传”,故有刘之遴“号为中篇”之称,此种可能性相对前者较小。对于《叙传》,我们可以推测,人们对“《叙传》作为《汉书》中的篇目”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最初并不为人们所共识,人们可能曾有把《叙传》作为单独篇目与《汉书》并列的观念,理由有二:一是《萧琛传》称北僧瓠芦中有“《汉书·序传》”,而萧琛得到的却又是《汉书》全本?此处的《汉书》、《序传》应为并列关系,而非后人所认为的从属关系;二是《太平御览》等所引《后汉书》(按,此《后汉书》作者无考)称班固“为记、表、传、志九十九篇”,而非百篇,很有可能也是未把《叙传》归属于《汉书》。

(七) 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汉书〉提要》认为卷即是篇,既然叙传中说明是百篇,《汉书》不当又为三十八卷。其实,虽然《汉书》篇、卷并用,在其《艺文志》中有的称篇,有的称卷,但班固还是注意到了卷和篇的区别,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条后专门用小字作注“为五十七篇”,大约在一部书中,卷数多于篇数。如果从《汉书》的卷帙和班固的具体创作状况来考虑,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则是较易理解的。《汉书》有百篇的篇帙,若单独分卷,则有百卷,这样过于零散,不易于保管,也不利于皇帝系统地进行审阅。而班固在创作时,很有可能依据创作先后、篇幅和类型等对初稿进行分组,这样既便于自己写作,也利于分卷向帝王上呈书稿。又第三十七卷为“解音释义,以助雅诂”,创作时间靠后,应为章帝建和年间上奏纪、传之后所作。由于《汉书》已出的部分受到当时人的欢迎,“学者莫不讽诵焉”,而又有“时人多未通者”的情况,大概班固专门作第三十七卷以“解音释义,以助雅诂”,后来班昭整理、校勘《汉书》,应该也参考了该卷。

(八) 古本《帝纪》后为《外戚传》,后又为“诸王传”。对于此编排顺序,《四库全书总目·〈汉书〉提要》认为“纪、表、志、传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则传次于纪,而表、志反在传后”,以今本《叙传》中已定的编排次序对古本加以否定。但若从《汉书》撰写的先后顺序来看,在“帝纪”完成后作传的可能更大。东汉统治者对于外戚和宗室问题非常关注,注重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特别是警惕外戚干政。虽然班固对《汉书》的篇目安排是按《叙传》中的已定顺序,但在写作时,把帝王更关注的内容在帝纪后先行创作以便及时上呈,这是很有可能的,且外戚、宗室之传和帝纪三者资料来源相近而集中,撰写时也比较方便。《外戚传》是以历朝后妃为中心的传记,而范曄书不再设《外戚传》,其内容入帝纪后的《皇后纪》中进行叙述,这种结构安排完全不同于《史记》和《汉书》的通行本,大约是基于对《汉书》古本篇目顺序的借鉴。

(九) 古本《叙传》中《韩彭英卢吴传·序》为“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相较今本“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展现了诸传主的才干和豪气,表现出肯定和钦佩的倾向,而今本则有

贬低、丑化的倾向。考《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虽然作者对其最终叛逆予以否定,但在赞中又指出是“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灭亡”,指出其叛逆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的,传中对诸传主的事迹叙述,并无因其身份的微贱而有所蔑视,相反,在对其丰功伟绩记述的字里行间充满的是敬佩之情,这与古本述的态度比较相似。又据清人顾炎武《唐韵正》卷五,“英”的古音为“央”,若把古本述与其后文“割有齐、楚,跨制淮、梁。绾自同闭,镇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吴克忠信,胤嗣乃长”连接起来,考查其押韵情况,则古本中“章”、“英”、“骧”、“梁”、“疆”、“殃”、“长”一韵到底,而今本则押两韵,“徙”、“湖”,又“王”、“梁”、“疆”、“殃”、“长”,以班固的个人文学修养而论,古本中述更有可能为班固所作。至于与今本中述的不同,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五“汉书古本”条“宋景文校刻时,其所校旧本内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与今同,则今本即曹大家所定无疑也”,则《汉书》今本可能由班昭所定,而班昭在经历班固因私撰《汉书》下狱事后,常“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忧,以益中外之累”^①,故作文、行事非常谨慎,大约是班昭在整理文稿时看出了班固原述的“不良”思想,怕因此会有所牵累而对之加以改作的。

综合以上,《汉书》流行本不同于《汉书》真本,刘之遴所校《汉书》古本的特征符合于《汉书》的创作情况和所处时代,因此《汉书》古本是真本。

(作者通讯地址:李艳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宁学院中文系 272000)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范晔《后汉书》卷84《列女传》,第2786页。